

崇川往事

大王庙小学旧事(中)

□李大潜



2009年,李大潜与张祖彤老师合影。

大王庙小学的老师给了我们认真的启蒙教育,对我们的呵护和关心无微不至,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们。抗日战争胜利后,校长是袁捷老师,她住在我家附近的习家井巷。她没有教过我的课,但我觉得她还是比较和蔼的,对她留有好的印象。还有一个周琪老师,也住在习家井巷,和袁校长家似乎门对门。她也没有教过我的课,但表现一直很出色,后来成了通师二附的校长,曾好几次邀我到该校访问,我们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后,她曾作为南通市的党代表出席过全国的党代表大会,会后还送给我会上发的两支铅笔,颇有纪念意义,对我也是极大的鼓舞。她是南通教育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现在仍然健在,已有98岁了,愿她一直健康长寿。

张祖彤老师是我们五年级甲班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她当时刚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曾受教于著名教育家张梅庵先生。她的一个孪生妹妹张祖铭,同时任五年级乙班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可以说,张祖彤老师是我小学阶段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成长。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课堂上教我们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情景,流亡的悲愤、悠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第一次认识到音乐催人奋进的战斗力量。那时的语文老师及班主任能熟练地弹奏风琴,兼顾起音乐老师的职责,在现在也应有其启示作用吧。

寒假中我曾经到她家去拜年。她们住在东门外一个僻静的小巷中,清贫的小屋朴素而整洁,她们姐妹二人正对坐在方桌两边,用毛笔练习书法,这大概是她们日常的功课吧。看到一个老师自己在用功苦练,对我的教育启示作用,比她们在课堂上语重心长的教诲不知要有力多少倍,这是教育了我一生的。我那时“两”字的发音发不准,常念成“仰”音,她们就多次引我发这个音,并认真纠正。谈

了一阵,我急着要回家,她们说我“归心似箭”。我那时不知道这个成语,还以为是“归心事见”,即我的“归心”被她们发现了。她们就给我讲“归心似箭”的含义,我迅速就明白了。这样看似漫不经心地交谈,实质上是极为生动有效的语文辅导,但平易近人、润物无声,使我终身受益。

张祖彤老师当时应该是很倾向进步的,我曾听到她课间在办公室用风琴弹奏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在国民党当政的时代是很犯忌的。可能正由于此,我五年级肄业离开大王庙小学不久,她们姐妹即被调到唐闸郊区的一个学校任教了。

我刚进入商益中学,因在小学中一直顺利而养成的心高气傲、考试抢交头卷的坏习惯,使我在一个月后的第一次数学测验中只得了18分,差点被老师按规定用戒尺打42下手心。我在大王庙小学的一些原来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在我家窗口齐声高唱“李大潜,中学生,算术考了18分”,更使我无地自容。这一奇耻大辱使我沮丧,更给我带来了一辈子的警示和教训。在我处于极度困难的环境时,张祖彤老师从唐闸乡下,用她批改作文的紫色笔给我来信,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和勇气,使我在跌倒后迅速地站起来,第二次数学测验就考得了98分。张祖彤老师给我的这封信现已无存,她当时具体说的什么话也记不清了,但她那一片紫色的墨迹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如今午夜梦回,独处自省,总为此感慨万分,并催我奋进。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将张祖彤老师视为我人生的导师,每次回南通都要到其住处探望,聆听她的教诲。在她去世前不久,还曾到她住院的第三人民医院探视,想不到竟成永诀,后来亦曾两次到她的墓前祭奠。张祖彤老师对我的教育恩、师生情,无疑是大王庙小学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王庙小学老师留给我的,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大概在

三四年级的时候,数学课老师请假,有一个男的体育老师来代课。他一走上讲台,就用龙飞凤舞的笔法,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算式,问我们等于多少。其实,他写的只是一个个数相加的算式,但大家看不懂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个个莫测高深,一时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后来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免哑然失笑,也一下子失去了对他“五体投地”的尊敬。下一堂课,这位代课老师就不再出现了。

在大王庙小学,我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曾无辜地受到了一个老师的惩罚。有一天上午课后,一个同学说给我表演一个魔术,他拿了一张钞票说要撕掉,但撕声过后,他手上的钞票完整无缺,只是钞票后暗藏的一张纸被撕成了两半。我看这个把戏并不难,也拿出自己身上的一张钞票试了一下,但手法不熟练,撕掉的不是那张纸,而是钞票!这本是童年小朋友间的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恰给当时的班主任老师看到,在本该回家午餐的时候把我留在学校不许回家,直到家中派人来查问才将我释放。尽管家中没有追究,老师也不再提起,但多少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阴影,也一直对这一处罚感到莫名其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如果多一些爱护,更加宽容和人性化一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我在大王庙小学的同学,绝大多数住在离学校不远,甚至就在学校附近。看来就小学而言,就近入学实在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我现在还记得出来姓名的班上男生有朱纪吾、生克廉、倪钧、倪本、刘文光、李培根,女生有卢文澜、刘丽君、蒋惠玲、季敏华。当年的这些同班同学年龄都比我要大一点,后来的履历及命运也各不相同,但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一定深深地怀念在大王庙小学这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并衷心地感恩于我们的老师为培养和造就我们所做出的深情而无私的奉献。

启海谈故

崇启海
历史上的疫情防控

□何泰

19世纪20年代,霍乱自海外传入中国,流行于沿海通商口岸,并向内地扩散。江苏沿江一带,首当其冲。每次长江流域霍乱大流行,扬州、泰州、南通地区的仪征、江都、泰兴、靖江、如皋、海门、启东、崇明等地均受波及。严重流行之年,人命朝不保夕。夏季是崇启海一带肠道传染病的发病高峰季节,伤寒、副伤寒、恶性疟疾、痢疾屡见不鲜;冬春季节又有天花、麻疹、白喉、百日咳等呼吸道传染病横行肆虐。百姓均受病魔困扰。清光绪初年“丁戊奇荒”。此时,崇启海一带亦出现大饥大疫之情形。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霍乱自扬中、仪征依次东进,崇启海居民中染病者很少得救。民国年间,天花、白喉、百日咳、麻疹、伤寒、恶性疟疾、痢疾、猩红热等流行。崇启海一带均受波及。

国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虽有疫情报告的规定,但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只有发生特大疫情时,才专件逐级上报。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种痘条例》等,指定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9种法定传染病,并制定包括传染病报告、登记、隔离、检疫、预防接种等环节的管理与预防措施。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在1934年卫生署制定的《城市小学学校卫生实施方案》,要求全国城市一律组织健康教育委员会,实施学校卫生,包括在校学生的定期体检、传染病预防和管理等。上述规章制度的公布实施,对传染病的防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抗战事起,上述规章制度未能有效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崇启海地区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加强对传染病的控制和管理,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经常、有突击地结合各种中心工作,重点加强计划免疫和基础免疫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蔓延。1951年崇启海三县卫生院就发动全体医务人员对城乡居民普遍种牛痘,当年即基本制止了天花流行。1955年起贯彻执行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传染病管理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加强传染病的管控。1958年11月,崇明县划归上海市管辖。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始,启东、海门两县的县、公社、大队医疗单位完善疫情一本账制度,历年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先后使用牛痘、霍乱、白喉、百日咳、痢疾、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破伤风二联、霍乱伤寒、副伤寒甲乙四联、流行性脑膜炎、鼠疫苗苗等20余种生物制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天花消灭后,每年春冬两季仍下达种痘任务。从1977年开始,启海两县对7周岁以下儿童,全部登记、建卡、发证,按照儿童免疫程序,实行计划免疫。两县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麻疹疫苗的覆盖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均达到80%以上,城镇则达到90%以上。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麻疹等疾病自实行计划免疫以后,均被有效控制。猩红热、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等传染病,也只是偶有发生,未出现流行。